

文化安全:风险的现实与现实的风险

——基于北约国家“认知战”新动态的前沿考察

丁 剑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认知战对全球文化安全的影响及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文章通过分析北约利用文化软实力影响全球权力结构的策略,指出其通过控制公众意识形态和对文化的认知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并揭示这种策略对他国文化主权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为有效应对这种非传统安全风险,需要优化国家的文化安全策略,建立更加全面的国家认知安全机制,以增进决策者及公民对认知战的了解,提升他们对文化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能力。

关键词:文化安全;文化软实力;认知域;认知战;认知管理;北约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4-0101-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4.011

Cultural Security: the Reality of Risks and the Risks of Reality: A Cutting-Edge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New Dynamics of "Cognitive Warfare" in NATO Countries

Ding Jian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Abstract: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s rapidly,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warfare on global cultural security and the role it play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study analyzes NATO's strategies of leveraging cultural soft power to influence global power structures, highlights how control over public ideology and cultural cognition is utilized to achieve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reveals the severe threats posed by the strategies to the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of other nation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is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risk, it is essential to optimiz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ognitive security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public and policymakers' ability to both understand cognitive warfare and recognize and prevent cognitive risks towards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al soft power; cognitive domain; cognitive warfare; cognitive management; NATO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

的历史转折时期,“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发,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

收稿日期:2024-02-26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安全视域下山西省市域社会现代化研究”(2022YJ009)

作者简介:丁 剑(1989—),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安全研究。

景下,习近平总书记 in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早在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世界文化报告》中指出,“在当今的文化态势中,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2]文化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其他各类安全的精神纽带。目前,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不大,真正构成威胁的是来自文化领域的风险。作为一种隐于认知、发于思想、斗于舆论、争于民心、立于法度、显于生活的重大风险,文化安全风险具有意图隐匿、方式隐蔽、边界模糊、危害性大和文化渗透门槛低等特点。如今,北约国家相继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研究和试验“认知战”(La guerre cognitive),这给本就异常复杂的文化领域带来了新的变数。关于认知战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是以下观点已被广泛接受。第一,认知战是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时代课题。第二,认知战作为一种综合了社会科学和新兴科学技术的方法,旨在改变特定目标群体(或个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决策制定机制来间接影响人的行为。第三,认知战既可以被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用来控制、瓦解或“瘫痪”对手,也可以交织在传统安全领域,为战争创造有利条件,即“在战争之前赢得战争”。其实,关于认知战的实践古已有之。当今,它之所以被世人重新重视,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认知战的效能有了长足发展;二是核大国之间不能轻易动武,而认知战是一种使用门槛低、效费比高的博弈手段。为此,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安全,并清楚地了解什么是认知战?其发展现状、前景如何?我们

该如何保护自己?北约作为现代认知战的发明者,在该领域有着深入的理论研究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对北约认知战的最新动态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我国识别、应对和化解认知领域的安全风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安全性和主动权。

二、北约“权力原动力”的转向与“认知战”的发展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人对战争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特别是北约国家的一些民众不断向政府施压,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抵触传统战争的氛围。在社会心理学视域下,这似乎是由传统战争给大众留下的“心理创伤”(Le traumatisme psychologique)所致,但如果从“认知管理”(Cognitive Management)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权力原动力”(La dynamique de puissance)转向的结果。“在21世纪,世界性权力的建构不再将领土征服作为核心内驱力……随着殖民帝国和意识形态集团的消失,领土利益已不再具有过去在全球政治中的主导地位。”^[3]这些变化体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在21世纪,“文化软实力”(Le soft power culturel)将成为构建世界性权力体系的核心因素。这在客观上表明权力原动力的运动轨迹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它不仅改变了国家安全的模式,即传统安全地位的相对下降与非传统安全地位的显著提升,更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认知战作为北约依托文化软实力稳固其世界性权力体系的主要途径,是北约集体意志的集中表现,其问世标志着“人的大脑在21世纪已经成为新的战场”^{[4](P16)}。在这样的背景下,前文提到的世人对战争的理解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北约成员国的一些民众不断向政府施压,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抵触传统战争的氛

围,本身就是北约依托影响力实施认知管理(对内称认知管理,对外称认知作战)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新质权力”(New Qualitative Power)体系转型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总之,无论是作为进攻方还是防御方,“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都已经扩展为国家安全的新场域。认知安全作为一种现实的风险,被迫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认知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的新职能,其影响力建设成为各国政府的新任务。可以说,这是对“制脑权”(La supériorité cérébrale)的争夺,是21世纪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表现形式。

事实上,这种权力原动力的转向既是北约各成员国博弈的结果,也是美国作为北约的实际领导者为维护其世界性权力体系运行而采取的基于现实主义的策略调整。自苏联解体以后,两极格局被打破,美国主导的联盟建立了全球性的权力体系,美国凭借其绝对的军事、金融、地缘政治、关键技术和对资源通道的把控等优势制约着全球经济发展与历史走向,但是这个超级大国也因连续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暴露出了自身的脆弱性。为此,美国战略界开始反思:当今世界权力的本质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或者说,衡量全球性权力的传统标准是否仍然适用当今时代?西方战略学界普遍认为,在21世纪,诸如军事力量、地缘政治影响、能源供给、货币价值、工业活力以及在尖端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等一系列传统的评估世界性权力的标准已经落后于时代,因为它们忽略了评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例,在五十年代的冷战中,依赖的概念逐渐代替了独立的概念,而独立曾经是权力意愿的最基本表达。”^[5]在两极格局下,北约与华约长期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这使得北约内部的西欧国家产生了一种牺牲主权换取“团结”

以共同应对华约威胁的倾向,并最终导致北约各成员国逐渐沦为美国的附庸。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种联盟关系的弊病逐渐显现,北约各成员国希望重获主权,寻求战略自主。欧盟的建立、欧元的发行和组建欧洲军的“愿景”使美国感受到了来自联盟内部的压力。于是,美国开始反思原有的权力关系和敌我观念,逐渐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中涌现出了新的、非意识形态的盟友与对手之间的力量关系”^[6]。例如,军事上的盟友可能是经济上的对手,而经济上的伙伴则可能是军事上的敌人。为此,美国通过北约框架,以“新欧洲”为杠杆撬动“老欧洲”,重新整合了欧洲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举措就是通过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对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的一切竞争对手,都采取认知干预行动。

为加强认知干预行动效能,美国政府整合了之前相对分散的与认知战相关的职能机构,于2022年3月成立了“影响力与认知管理办公室”(IPMO)。IPMO挂靠在美国国防部旗下,主要任务是通过美国自身的影响力,综合运用各种“软”的文化手段,针对特定对手制定认知影响力战略,进行对抗性和战略性宣传,指导下属机构开展与认知干预有关的行动。作为认知战策划和指挥中枢,其名称凸显了认知战的两大要素:影响力和认知管理。事实上,认知管理和影响力建设是文化安全的两大要素,前者是形式,表现为一种治理术;后者是内容,表现为依托现代科学技术而建立的信息或文化霸权(hégémonie culturelle),开展认知战的目的是为权力运行服务。具体来说,是“保护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技术优势,建立与盟友之间的持久依赖关系,主导全球最先进的产业领域,并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决定性的领先地位,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3]。出于上述目的,美国的认知战不仅针对敌人,还对准

了盟友。早在20世纪末,美国就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宣称自己是全球信息技术的领导者。由于长期依附美国,彼时的北约成员国早已丧失了在网络信息、人工智能、数据采集和软件工程等关键领域的技术优势,只能在美国的技术和产业链体系中充当辅助角色。毫无疑问,这是美国通过认知管理和影响力建设长期进行系统性渗透的结果,也从侧面证实了认知战是美国与盟友建立持久依赖关系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敌友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权力的概念有了新的内涵”^[7]。这一新的内涵表现为,某国对对手认知域的征服比军事占领更为有效,通过合作和竞争实现对全球的“软统治”,依仗认知管理和影响力建设,不断进行具有指向性的精神生产,让世界对自己产生依赖从而主导国际秩序。特别是认知战不会导致流血牺牲和城市被毁的惨烈场景,不会让人产生心理创伤。这在客观上迎合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要求,使得发动认知战的门槛变得更低,认知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宣而战,也不用顾忌传统战争所产生的一系列后遗症。认知战的高费效比导致拥有“文化霸权”的一方可以对弱势的一方肆无忌惮地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全面打压,这从侧面反映出当今文化安全领域极具风险的现实。

三、风险的现实:认知域已经成为新的“行动场域”

2020年,埃尔韦·勒吉耶德(Hervé Le Guyader)和奥古斯特·科尔(August Cole)在“北约创新中心”(NATO-Innovation Hub)发表了题为《认知域:行动的第六场域?》(*Cognitif: un sixième domaine d'opération?*)的前瞻性报告,明确地将认知领域与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网电空间并列,提出应把“认知域设定为北约的第六个行动领域”^[8],以确保北约在这个新

场域保持领先。法国作为北约成员国中的文化强国,对认知战较为敏感。早在2019年7月11日,法国“国防创新局”(l'Agence de l'innovation de défense)就发布了一份名为《超越想象》(*Imaginer l'au-delà*)的指导文件,宣布创建名为“国防红队”的假想敌团队,并由国防创新局、总参谋部、武器装备总局以及国际关系和战略总局合作,共同实施一项计划:组织一批未来学家、编剧、科学家和军事专家展开合作,共同预测未来可能威胁法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场景。2021年7月,“国防红队”向法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名为《宣告文化死亡的编年史》(*Chronique d'une mort culturelle annoncée*)的报告。据报道,该报告预测了“在2050年,认知战争被全面推广并走向极化,法国必须加强认知作战的能力,确保能够战胜善于通过欺骗、颠覆或操纵信息以改变集体行为对手,维护国家安全”^[9]。上述这些事例印证了认知域已经成为北约国家极为关注的新“行动场域”(Domaine d'opération)。虽然理论界对认知战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2021年6月21日,“首届北约认知战科学大会”(Prémière réunion scientifique cognitive warfare)在法国波尔多市举行,该会议由“北约创新中心”(ACT-OTAN)主办,由“法国国立认知技术高等学校”(ENSC)协办,会议得到了北约科技组织(IST-OTAN)、新阿基坦区(La Région Nouvelle Aquitaine)和法国武装部队参谋部(L'État-Major des Armées)的支持。大会以“认知战:认知领域的未来”为主题,围绕认知战的概念、第六行动领域、认知战如何成为可能、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信任和这种信任引起的认知偏差、人类网络认知系统的技术现状、叙事压倒世界、网络心理学、态势感知和共享以及认知战的复杂性和简单性等问题

展开了讨论。北约科学技术组织信息系统技术领导小组(Le président du IST de STO de l'OTAN)主席索菲亚(Sofia)总结会议内容时指出,“北约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的战士,并让他们为认知战做好准备。因为技术总是改变不同角色进入冲突的方式以及战争的战略、行动和战术,但最近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对不同群体的认知产生颠覆性影响的程度,这完全改变了战争的哲学。毫无疑问,随着认知战的发展,传统冲突的数量可能会减少,斗争的主要目标将瞄准人们的思维。”^[10]

2023年10月26日,法国“国防高等研究所”(IHEDN)和“经济情报研究会”(AAIE-IHEDN)在巴黎军事学院联合主办了主题为“认知战争:科幻还是现实?”的研讨会,就认知战的本质、挑战、前景以及对文化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当前社交媒体观点极端化的倾向、政府公信力的危机、民众对国际关系和社会问题的偏见,以及国外势力对本国文化机构的渗透等现象的背后都有认知战的“影子”,它们是文化操纵术与新型技术工具相结合的结果。“面对这一现实的威胁,迫切需要审视、理解和应对这个我们所有人都关心的新的战场。”^[11]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北约已经把文化风险的现实转化为现实的风险——认知战。无论我们接受与否,将人脑作为新的博弈场已经成为现实,并且这种现实必将在大国博弈中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此外,信息技术革命加剧了认知域的竞争,认知管理成为北约国家争相研究的课题。法国国防部在2021年1月发表的《战略现状》(*l'Actualisation Stratégique*)中指出,“信息操纵是我们对对手实施混合战略的关键手段,它以影响、瘫痪或混淆对手为目的,是一种悄无声息的颠覆形式。”^[12]同年10月,法国国防部长

弗洛朗丝·帕利(Florence Parly)在发布报告《信息斗争影响力军事学说》(*La doctrine militaire de lutte informatique d'influence*)时重申:“信息操控是一种武器,如果恰当使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对抗信息侵扰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优先事项,这种能力必须发展起来,以免受到对手的操纵。”^[13]由此可见,认知战已经成为北约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构成了文化安全领域现实的风险与挑战,也对大国博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风险,深入研究这一新的国家安全课题,理清认知战发展的来龙去脉。

四、认知战发展历程

事实上,认知战实践古已有之。就战争的本质而言,它是“在具有冲突性的环境中智慧的辩证法”^[14]。一方面,战争是对敌人意志的征服。现代战争理论之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用来迫使对手屈服于我方意志的暴力行动。”^[15]另一方面,大脑是这种意志之所在,即大脑是个人意志的物质载体。更广泛地说,是否参与战争、如何进行战争,以及接受战败的决定等都是在大脑中形成的。此外,“在战争中,理解对方并了解其意图,或者欺骗对方使其误解我们的意图,一直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计谋和所谓的心理战术是不朽的军事因素。”^[16]由此,博弈各方必然时刻在捕捉对手的信息并作出预判以获得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斗智”先于“斗勇”。

其实,欺骗与隐藏自身意图的起源同战争一样古老,其目的和当今的认知战一样,都是对敌人进行认知管理,即通过操纵信息、误导对方,使其出现认知偏差,从而让战争态势朝着有利于自身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可以说,

“诡计在战略的历史中已经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基于掩饰和欺骗的战术手段,而且是一种激发战略规划和适应不确定性情境的智力品质。”^[17]由此可见,战略是研究对方的一门科学,是敌我不同主体之间力量与意志的军事辩证法。这就内在地规定了战争从一开始就试图进入对手的“大脑”,即认知域。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为认知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效能正以指数级的速度提升。具体而言,现代认知战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这一历史时期,东西两大阵营在“大脑之战”中围绕意识形态叙事构建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颠覆行动、心理战、对抗性宣传和战略欺骗是两大阵营博弈的主要方式。“对抗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各自的意识形态叙事上,即叙事内容之间的较量,而消息的传播媒介和接收者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16]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2022年美国成立“影响力与认知管理办公室”(IPMO),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典型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地缘政治巨变与互联网的崛起交织在一起,认知对抗的核心从意识形态叙事的对抗转向为信息本身的对抗。叙事或信息的内容已经不再是博弈双方唯一的争夺目标,掌握信息的传播媒介变得与信息内容同样重要。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l'ère de la post-vérité),即一个以互联网、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信息爆炸和虚假新闻泛滥为标志的时代。第三阶段是当前和未来的阶段,即争夺“制脑权”的时代。随着“神经科学”(Neurosciences)、“认知科学”(Sciences Cognitives)的深入发展,以及“人工智能”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和“脑机接口”(Interface neuronale directe)等先进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对人的大脑进行争夺已经在技术层面具有可能性。认知战的第三阶段吸收了前两个阶段的结构元素,即信息内容(意识形态叙事)和信息媒介,又将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纳入其中,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全域认知干预工程,通过对大脑的征服与控制来影响目标人群或个体的行为,从而对目标社会进行系统化的改造。

回顾认知战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科学技术是认知战实现古今之变的催化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被科技赋能的现代认知战给人们“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带来的现实风险。事实上,现代认知战不仅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还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网络平台等媒介影响或操控公众意见。这种普遍的信息操纵能力,使“民意武器化”成为可能,万千大众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战略布局中的“棋子”。

五、现实的风险:民意的武器化

人类认知涵盖了推理、情感和感觉经验等一系列机制,这些机制使我们能够理解现实世界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由于认知是在现实世界中引导人们行动的基础,因此,通过操纵人的认知可以引导人的行为。事实上,认知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决策时,大脑需要综合多种思维系统,以作出符合其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和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对此,著名经济心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 *Système 1/Système 2: Les deux vitesses de la pensée* 一书中提出,人有两种思维系统:第一种是直觉和启发式的思维系

统,它能够帮助人快速作出决策,是一种自动的、直觉性的思考方式,适用于熟悉的、常见的情境。但这种思维系统具有快速特性,很容易受到个人偏见和经验的影响。第二种是理性和逻辑的思维系统。这种思维系统涉及更深层次的思考、分析和推理,通常用于处理更复杂的问题。相比“系统1”(Système 1),“系统2”(Système 2)不仅需要更多的思考时间,还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在决策过程中,这两个系统相互配合。“系统1”会自动触发一些简单的决策,而在复杂或不熟悉的情况下,“系统2”则会介入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和分析。有时候“系统1”的直觉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因此,在一些情况下需要“系统2”的干预来纠正“系统1”认知偏差所导致的错误判断。这两种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人脑动态的决策过程。

认知战旨在利用上述两种思维系统认知功能的特性与不同目标人群的认知偏差以达到战略目的,也就是引发目标个体或目标群体对某个事物的扭曲认识并影响其决策,导致其战略失误。因此,认知战与信息战(La guerre de l'information)本质上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所追求的效果不仅是对信息的管控,还涉及对目标大脑决策功能和执行功能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知战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信息战的领域,操控信息只是为认知干预提供数据,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操控目标人群的思想及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基于此,“认知战是一种利用技术来改变目标人群认知的艺术,它的实施往往是在对手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是其门槛低、后遗症少的原因。”^[4]为了应对这种新的威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我们需要对现行的文化安全机制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因为认知战就是目标明确地针对决策机构和大众

所采取的认知干预行动,我们获取的这些“数据”(决策部门的情报和民众通过大众传媒所接收到的信息)很可能是被对方加工过的诱导性信息。所以,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或情报,要格外重视其获取渠道和处理过程。为此,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第一,提升认知主体“自知”的能力。“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旨在提醒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从认知对抗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首先了解自身的局限性,这有助于我们在决策或思考过程中避免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是文化干预行动得以成为可能的着力点,所以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在心理上预设出自己的认知短板或盲区是提升集体或个人认知对抗能力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核战略和情报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对对手的观念或价值观的误解,对他认为我们会像我们自己一样看待他的推定以及对他者的轻视,是导致冲突和不稳定关系最重要的原因。”^[18]

第二,思辨之光不能被技术万能论所取代。信息技术手段固然是现代认知域对抗的关键,但技术手段并不能完全驱散认知对抗领域的“迷雾”。相反,信息技术的井喷式发展导致了信息泛滥,制造了更多的战争“迷雾”。特别是认知偏差可能被先天地植入到算法和数据库中,制造出技术性的认知偏差。因此,对决策者和普通民众而言,永远不能因为技术崇拜而熄灭思辨之光,必须在信息时代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学习。

第三,要确立信息是一种资产观念。认知战的本质就是通过信息数据介入对手的大脑,影响其决策并制造混乱,最终破坏其行动以获取胜利。公开资料显示,北约国家正在利用高科技公司的相关资源对主要竞争对手进

行认知战,他们充分整合了各方资源,对网络和电子战技术、生物技术、信息和感知操纵技术等新兴技术进行了实验性的运用。技术交叉打破了认知战的战场时空阻隔,将参与者的范围由军队扩展至普通大众,使认知战的发动者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地操控目标群体的情绪,进而保证认知战效果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弗朗索瓦·杜·克鲁泽尔(François du Cluzel)作为北约创新中心的负责人,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认知战争》(*Cognitive Warfare*)中印证了这一事实。该报告指出,“任何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用户都将是认知战潜在的目标,它瞄准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个人力资本。”^{[4](P6)}这种新型战斗模式没有地理边界,也没有时间限制,“通过互联网,这个战场是全球的。这个征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在我们智能手机的通知中不间断地发生着,无论何时何地,全天候发生”^{[4](P15)}。并且,认知战与信息战和心理战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并成为一种武器,并且在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毫不知情的。认知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信息的处理和知识的生产。这是一种微妙且重要的变化。过去,个体只是被动地接受宣传,而现在他们积极主动地为其做出贡献”^{[4](P9)}。毫无疑问,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新型安全风险,拥有认知霸权的国家或联盟可以将民意武器化,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武器”^[19],操控目标群体的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目标政府的政策,这无疑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六、结语

在认知域成为大国博弈新场域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的认知风险与日俱增。为有效

应对这种复杂形势,一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文化自信,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意义,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人民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能力。在学校和社会层面,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使之成为国家软实力和文化遗产的基石。二是必须积极构建全方位的信息防御体系和反制措施,完善维护自身认知的安全体系以应对各类认知干扰,如通过完善网络安全法规和相关政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能力。三是借助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优势,开发先进的信息分析和心理评估工具,以此在公共安全、网络舆情监控和国际形象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国内外舆论动态,提前识别和化解可能的认知风险。四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认知技术交流合作,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通过文化交流加深与沿线国家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共同抵御认知战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地缘政治的日益复杂化,认知域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可忽视的新战场。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认知战给我国文化安全和国家主权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未来的认知战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文化实力和价值理念的竞争。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与智慧的策略,加强全球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有效维护文化主权和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6.
- [2] 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
- [3] Christian Harbulot.De la légitimité de la guerre cognitive [J].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2004,56(04):63-67.
- [4] François du Cluzel. Cognitive Warfare[R]. Norfolk:(ACT)-NATO sponsored study,2020.
- [5] Christian Harbulot, Didier Lucas. La France a-t-elle une stratégie de puissance économique? [R]. Limoges: Lavauzelle,2003.
- [6] Christian Harbulot, Didier Lucas. La guerre cognitive-l'arme de la connaissance[R].Limoges:Lavauzelle,2004.
- [7] Aymeric Chauprade.Les chemins de la puissance[M].Paris:Ellipses,2004:71.
- [8] Hervé Le Guyader, August Cole. Cognitif: un sixième domaine d'opération? [R]. Norfolk:NATO-Innovation Hub,2020.
- [9] David Pappalardo.La guerre cognitive:agir sur le cerveau de l'adversaire[EB/OL].Le Rubicon,<https://lerubicon.org/la-guerre-cognitive/>.
- [10] Claverie B.Prèmiere réunion scientifique cognitive warfare [M]. Bordeaux: Ouvrage Publie Par Le CSO Du NATO,2021:69.
- [11] La Guerre. cognitive: science-fiction ou réalité? [EB/OL]. AAIE-IHEDN, <https://www. ie-ihedn. org/2023/10/05/26-10-2023-conference-la-guerre-cognitive-science-fiction-ou-realite/>.
- [12] Florence Parly.L'Actualisation stratégique[R]. Paris:Ministère Des Armées,2021.
- [13] Charles Thibout. La doctrine militaire de lutte informatique d'influence[R]. Paris:Ministère Des Armées,2022.
- [14] Hervé Coutau-Bégarie. Traité de stratégie[M]. Paris: Economica,2021:78.
- [15]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20.
- [16] Olivier Pinard Legry.Neurosciences et sciences cognitives: comment se préparer à la guerre des cerveaux?[J].Revue Défense Nationale,2022,N° Hors-série(HS3):58-76.
- [17] Jean-Vincent Holeindre. La ruse et la force[M]. Paris: Perrin,2017:388-389.
- [18] David Pappalardo. Dialectique guerre-révolution une histoire de passions,d'idéologies et d'occasions manquées [J].Stratégique,2021,N° 124(04):165-185.
- [19] Roberto Pecchioli. Le cerveau humain, une arme semi-secrète de l'Occident[EB/OL].Participez à Agoravox, <https://www. agoravox. fr/tribune-libre/article/le-cerveau-humain-une-arme-semi-242810>.

声 明

本刊第38卷第5期发表了王淑庆和吕俏的论文《时间涨块论的认知反驳及其回应》。经作者和读者仔细审查后,发现其援引并探讨文献[19]提出的“咬紧牙关”策略及相关论点时,未在正文相关段落(第38页第8段、第39页第5段、第40页第2段)中进行恰当地引用提及原作者谢沛宏的姓名。

为纠正这一引用不规范之处,维护学术的严谨性,特此发此更正声明,敬请广大读者和作者予以谅解。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